

# 清末新政中的袁世凱與 張謇聯盟

• 駱寶善

光緒三十二年(1906)清廷宣布籌備立憲，標誌着清末新政的高潮和整個立憲運動的高漲。以之為契機，主張君憲的朝野兩大，袁世凱和張謇結成了聯盟，並直接影響中國政壇十年之久。

袁世凱以小站編練新建陸軍起家，再擢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直接參與中央的新政決策與執行，成為全國性的政治人物。張謇抱實業救國之宗旨，以狀元之尊榮，棄官從商，又由商而政，興辦教育，關注國家政局，醉心清末新政。他是聲名卓著的以上海為中心的東南實業家和社會領袖，兩江總督的座上客，尤其羨慕直隸新政及其引領者袁世凱。

—

眾所周知，自從光緒十年袁世凱與張謇兩個年青人絕交，直至庚子辛丑時期，二人再無往還。

進入二十世紀，物是人非。三年多光景，袁世凱以小站編練新建陸軍起家，而膺封圻，而再擢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位躋疆吏之首。從而倡導並引領了庚子以後的清末新政，直隸成了全國新政的模範省。清廷還授命袁氏兼任政務、練兵、電政、督辦鐵路、商務商約諸大臣，直接參與中央的新政決策與執行，成為具有全國性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因而他也需尋求更廣泛的，尤其是江南新興的近代實業勢力的支持與擁護。江南實業界的領袖人物張謇，自然是袁矚目的首選。對於方興未艾的君主立憲政治思潮，袁雖一時尚未表態，但它要發展成為政治運動，自然也邁不過袁的這道坎。

張謇於光緒二十年甲午科大魁天下，特立獨行，抱實業救國之宗旨，以狀元之尊榮，棄官從商，又由商而政，興辦教育，關注國家政局，醉心清末新政。君主立憲思潮興起，張又成為十分積極的呼籲和倡導者。不出十年內，就成為聲名卓著的以上海為中心的東南實業家和社會領袖。他是兩江總督的座上客，尤其羨慕直隸新政及其引領者袁世凱，在辛丑以後所著的日記和自訂年譜中，不時有所流露。例如，光緒二十九年未提及漁業公司事說：「發端當自北洋，南洋不足與有為也」<sup>①</sup>。當時，張氏未到北方直接考察，只是耳聞。待到直

接實際考察所見，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宣統二年(1910)，南洋勸業會開幕，張氏參觀了直隸館後說：「觀直隸別館，頗覺袁為直督之能任事。此人畢竟與人不同。工藝殊有擅勝處，江蘇不及也」<sup>②</sup>。次年，張氏在天津參觀工廠、市政建設後說：「慰廷要是不凡，……舉世督撫，誰能及之」<sup>③</sup>。

張氏深知，倡行政治改革、君主立憲，需要有體制內，即在朝的實權人物作為政治領袖，當時的袁世凱是最佳人選了。其時，張之洞(已卸署兩江總督，但仍在江寧)以及政治密友湯壽潛等都勸告張謇聯絡袁世凱。於是，在大費力氣七易其稿，為張之洞、魏光燾(兩江總督)擬定了〈擬請立憲奏稿〉之後，乃於光緒三十年五月(1904年6月)，致函袁氏通款曲。張氏在《自訂年譜》中記述其事說：「以請立憲故，南皮再三囑先商北洋，湯壽潛亦以為說。余自金州歸後，與袁世凱不通問者二十年，至是始一與書。袁答：尚須緩以俟時」<sup>④</sup>。直至目前尚未得見這通千言長函的全文，僅在沈祖憲、吳闈生編纂的《容庵弟子記》裏，有簡略的要點節引<sup>⑤</sup>：

時張謇寓書與公請主持立憲。言：「公今攬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與國家有死生休戚之誼，顧亦知國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變政體，枝枝節節之補救無益也。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變政體，而為揖讓救焚之迂，圖無及也」。又言：「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今全球專制之國誰乎？一專制當眾立憲，尚可倖乎？」又言：「日本伊藤、板垣諸人，共成憲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績，特命好耳。論公之才，豈必在彼諸人下？即下走自問，志氣亦必不在諸人下也」。云云，洋洋千言，公極激賞。

袁氏覆信，至今亦未見刊布，只見於張氏自訂年譜中節錄一句話。袁氏對張氏來信的態度與表示，張謇所說，是認為實行立憲時機尚不成熟。《弟子記》則說，十分激賞張氏對時局的透關觀察與救國熱情。各自記述了張袁往覆函的一個側面，雖互異，亦可互參並存。

尤具歷史意義的是，二十年前，張謇以三千言領銜長函與袁氏絕交，二十年後，張氏又以千言長函主動與袁氏復交，表現了張氏不計個人得失，救時救國的熱忱，以及當時朝野兩大的結合與互動。

張氏深知，倡行政治改革、君主立憲，需要有體制內，即在朝的實權人物作為政治領袖，當時的袁世凱是最佳人選了。二十年前，張謇以三千言領銜長函與袁氏絕交，二十年後，張氏又以千言長函主動與袁氏復交，表現了張氏不計個人得失，救時救國的熱忱，以及當時朝野兩大的結合與互動。

## 二

光緒三十一年，受日俄戰爭的刺激，朝野呼籲立憲之聲高漲。清廷決定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前後，張謇一面給袁氏寄去先期翻譯編輯的《日本議會史》、《日本憲法》等書，一面再次致函袁氏，促請其領導立憲運動。張的信說<sup>⑥</sup>：

吳世兄北去，三日，適自江北至滬。心所欲言，略屬奉致一二，不審達聽以否？……萬幾決於公論，此對外之正鋒，立憲之首要。上年公謂未至其

時，亦自有識微之處。今外度日、俄之前途，內揆徐、劉之近效，針鋒相值，似當其可矣。曩言萬世在後，歷史在前。今更為公進一說：日處高而危，宜準公理以求眾輔。以百人輔，不若千；千人輔，不若萬；萬人不若億與兆。自非有所見，不為公進此一言也。且公但執牛耳一呼，各省殆無不響應者；安上全下，不朽盛業，公獨無意乎？及時不圖，他日他人，構此偉業，公不自惜乎？慮吳世兄不能盡述鄙意，謹再言之，不能寫孤懷之百一也。

信中所說傳話的「吳世兄」，當是袁張二人的摯友，吳長慶次子吳保初。出洋大臣遭炸彈轟擊後，張謇立即致電端方表示慰問，並促其「奏布明詔以消異志」<sup>⑦</sup>。袁覆信說<sup>⑧</sup>：

頃奉惠函，並《日本議會史》等三種各二百部。仰見提倡憲政，嘉惠後學之苦心。自明詔既頒，薄海臣民，言隗事雜。某曾飭學習法政之員，撰《立憲綱要》一冊。願卷頁簡略，於彼中成立變更之故，未暇臚列。今得尊處編譯之日、英二史，本末俱備，龜鑑昭然，有裨於政學界者不鮮。已遵將原書發交提學司，並飭照價寄繳，以副雅懷。各國立憲之初，必有英絕領袖者作為學說，倡導國民。公夙學高才，義無多讓。鄙人不敏，願為前驅。

張謇以推行憲政的魁首期許於袁世凱，而袁奉張為以學說「倡導國民」的「英絕領袖」，他們各自在心中為對方做了定位。清廷下詔宣布仿行立憲，頒諭任命「編纂官制」的十七位官員中，僅袁世凱一人是地方大吏，其餘十六人都是王公貴族、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中央部院大臣，但真正實權在握的操盤手，主要是袁世凱一人。

張謇以推行憲政的魁首相期許於袁，袁世凱奉張為以學說「倡導國民」的「英絕領袖」。他們各自在心中為對方做了定位。

在五大臣出洋的派遣問題上，由於一些實際情況的影響，袁世凱的動作有些遲緩，因而曾被張謇批評為「規候風色不決」<sup>⑨</sup>，載澤指責其為「大阻」<sup>⑩</sup>。但總的說來，袁仍是最實際支持者，他撥款十萬兩銀子作為考察經費<sup>⑪</sup>。

光緒三十二年，五大臣考察回國。張謇又分別在上海和天津進行最具實效的迎接與鼓動。據張氏之子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記述，張謇等曾在上海先後四次謁見載澤等，「謁力勸其速奏立憲，不可再推宕」。袁世凱則在天津同五大臣具體而實際地討論了籌備立憲與官制改革的事宜，為五大臣回京覆命提供了切實的幫助。

七月十三日（9月1日），清廷下詔宣布仿行立憲。多年來全國上下，朝野鼓吹的改革政治體制、實行君主立憲的呼聲，從此一變而為開始籌備實行。關注君憲政治人們一片歡呼雀躍。

次日，清廷頒諭任命「編纂官制」官，他們是載澤、世續、那桐、榮慶、載振、奎俊、鐵良、張百熙、戴鴻慈、葛寶華、徐世昌、陸潤庠、壽耆、袁世凱，由奕劻、孫家鼐、瞿鴻禨總司核定，釐定官制，以為立憲之預備<sup>⑫</sup>。這十七位官員中，僅袁世凱一人是地方大吏，其餘十六人都是王公貴族、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中央部院大臣。但真正實權在握的操盤手，實際上卻主要是袁世凱一人。這從七月十八日（9月6日）設立的「編纂官制」的辦事機構「編制館」的人員組成可以得到證實。「編制館」的職責是，第一，起草釐定官制的文件。第二，閱定各方送上的說帖。該館提調二人，孫寶琦和楊士琦。孫是袁的幫辦鐵

路大臣，楊是袁奏派的駐上海專辦電政大臣，都是袁的心腹。各課委員十二人，金邦平、張一謦是袁的幕賓或僚屬，其餘雖由各部院調入，但多係回國留學生擁袁之士。「編制館」實際是清一色的袁氏班底。

仿行立憲上諭頒布前，七月初七日(8月26日)袁世凱奉詔晉京。次日起，慈禧太後連續召見四次，以「若不及早圖維，國事不堪設想」對，提出應該先組內閣，改革官制。退出後還揚言：「官可不做，憲法不能不立」，當以死力相爭<sup>③</sup>。袁還放言，「有敢阻立憲者，即是吳樾」，「即是革命黨」<sup>④</sup>。袁世凱把立憲視作鞏固清廷、抑制革命運動的法寶，也表達了袁一意立憲的決心。

在袁世凱的主持下，「編制館」擬定官制改革的摺子，由奕劻領銜上奏。例如：〈釐定中央各衙門官制繕單進呈摺〉、〈各部官制通則清單〉、〈閣部院官制節略清單〉等，並着手商定各省官制的改革<sup>⑤</sup>。按照張謇的期望，袁世凱真正成了在朝的推行憲政的鐵腕式的政治領袖。

十一月，張謇聯合滬上的鄭孝胥、湯壽潛等，組成「預備立憲公會」。這是當時中國規模最大、實力最為雄厚的立憲團體。稍後，張氏又被選為江蘇諮議局長，從而成為名副其實的立憲派中最具人望的領袖人物。預備立憲為袁張提供了合作施展他們政治抱負的舞台。

袁世凱官制改革主張的核心，是把「軍機處擬改為政務處，軍機大臣擬改為辦理政務大臣」<sup>⑥</sup>，實行三權分立的內閣制。這種主張被認為是從根本上動搖了專制皇權，而遭到朝野不贊成立憲和官制改革勢力的一致反對，言辭十分激烈，危言聳聽，稱倡行立憲之人是王安石，是「謀為不軌」，且集矢於袁世凱一身。親歷其境的張一謦記述說：「自預備立憲之疏上奏，先從編纂官制入手，而軒然大波起矣。先是京朝士大夫皆以北洋權重，時有彈章。……自都察院以至各部，或上奏，或駁議，指斥倡議立憲之人，甚至謂編纂各員謀為不軌。同事某君自京來淀(指海淀，其時為編纂官制館所在地)告余曰：外間洶洶，恐釀大政變。至有身齋川資預備屆時出險者」。北洋舊人唐紹儀、梁敦彥力勸袁世凱以赴彰德檢閱大操的名義出京而去<sup>⑦</sup>。

最後，官制改革只以中央合併一些衙門，成立一些新的部院而告終。袁世凱等官制改革的初衷未能實現。而且隨着中央新的衙門的設立，袁世凱還同時交出所編練的北洋六鎮陸軍的指揮權以及八項兼差。

張謇在江南聞訊，於第一時間致函袁氏，誠心致慰，並再示結好之意。張氏致袁信說<sup>⑧</sup>：

自七月十三日朝廷宣布立憲之詔流聞海內外，公之功烈，昭然如揭，日月而行。而十三日以前，與十三日以後，公之苦心毅力，如水之歸壑，萬折而必東；下走獨心喻之。億萬年宗社之福，四百兆人民之命，繫公是賴。小小波折，乃事理所應有。以公忠貞不貳之心，因應無方之智，知必有屈信盡利者。偉哉，足以伯仲大久保矣！吳武壯有知，必為凌雲一笑，而南壇漢城之間，下走昔日之窺公，固不足盡公之量也。欽仰不已，專書述臆，願聞宏旨。

袁世凱真正成了在朝的推行憲政的鐵腕式的政治領袖，他把立憲視作鞏固清廷、抑制革命運動的法寶。袁世凱官制改革主張的核心，是把「軍機處擬改為政務處，軍機大臣擬改為辦理政務大臣」，實行三權分立的內閣制。最後，官制改革只以中央合併一些衙門，成立一些新的部院而告終，未能實現袁世凱等官制改革的初衷。

張氏推崇袁為日本早期倡導憲政的領袖大久保利通，「而自居於小室信夫」<sup>⑨</sup>，並以當年他們共同的主公吳長慶（吳武壯）作感情交流的契點，重溫青年時代的情誼，坦然表示「昔日之窺公，固不足盡公之量也」，既表達了張氏之坦蕩胸臆，也表達了奉袁為政治領袖的誠心誠意。袁世凱在慨嘆之餘，覆函張氏說<sup>⑩</sup>：

輦轂七旬，波瀾四起，乃承寓書存問，感何可言。此次朝廷宣布立憲，釐定官制，俱由兩宮聖明，毅然獨斷。某不敏，豈敢貪天之力以為己功。而執事乃以大久保相期，惶愧惶愧。方今世變之亟，任事之難，如運百斛舟於驚風駭浪之中，而欲其誕登彼岸，行百里者半九十，豈不信然。但天時人事相逼而來，得英絕領袖之才如執事者，鼓吹群倫，隱然為輿論之母。萬流仰鏡，喁喁向風，蓋諸君子之熱誠毅力使然。當軸者祇從而利導之，豈曰能賢。此後，來日大難，百端待理，尚祈謹論嘉言，勤攻吾闕，是所願聞。

官制改革，無疑是清末新政，乃至全部立憲運動中，在中國移栽西方政治制度的最具實質意義的一試。袁、張作為朝野兩大，張氏為立憲派物色到了政治領袖，袁氏則尋找到了堅強的社會實力後盾。官制改革的小波折，並未減袁張對立憲的熱情。袁續撥銀子五萬兩，實際支持了籌備立憲的運作。

袁氏的覆信，坦然自認了朝內立憲運動政治領袖的地位，也再次尊稱張氏為「萬流仰鏡，喁喁向風」的「輿論之母」和「英絕領袖」。

官制改革，無疑是清末新政，乃至全部立憲運動中，向西方學習，在中國移栽西方政治制度的最具實質意義的一試，在這個意義上說，它可謂清末新政和立憲運動的最高潮。袁、張作為朝野兩大，以之為舞台，進行了充分的合作，實現了政治上的聯盟。張氏為立憲派物色到了政治領袖，袁氏則尋找到了堅強的社會實力後盾。當時政治制度以及客觀條件的限制，官員們之間還不許公然結盟，乃至不許有如後世的聯名「通電」之類的文字。袁張之間的書信往還互相期許，其實就是他們政治聯盟的宣言和保證。這個聯盟，一直維繫十年之久，直至袁稱帝之前。

官制改革的小波折，並未減袁張對立憲的熱情。袁續撥銀子五萬兩，以實際支持籌備立憲的運作<sup>⑪</sup>。編纂官制館，後發展為憲政編查館，亦仍為袁氏所掌握，直到袁罷官「回籍養痾」之後，尚源源不斷地為其提供完整的憲政信息。袁世凱對反對立憲的人們誣之為王安石之說大不以為然，致電端方說：「以因仍為宗旨，訛建議者為庸人自擾，比擬王安石，毋乃太過」<sup>⑫</sup>。

袁世凱也有選擇地回擊了對新政的無端指責。鐵良反對立憲最力，又是最具實力的新任陸軍部長，袁藉有人指責練兵腐敗之事致函鐵良，作出回擊。由於袁致鐵良的這封信函十分重要，又是新近發現的，故全文抄錄如下<sup>⑬</sup>：

寶臣仁仲尚書閣下：現閱邸抄，本月十七日內閣奉上諭：各軍將弁惟當簡拔傑俊，嚴杜夤緣，其應酬克扣之習，務即革除淨盡。欽此。整飭戎行，嚴防流弊，凡屬軍鎮，各宜懍遵。惟查柯侍讀原折內開：又聞各鎮練軍，其將弁多拔自武備學堂，雖講習有素，操演有法，然以夤緣請托而獲擢用者，實居多數。又上下相沿，專尚苞苴，至有員弁之薪水不足供營官之應酬，營官之薪水不足供統領之應酬者。又或藉軍衣等件，克扣軍餉，致士卒離心，日有逃亡等語。託之傳聞，言之確鑿。果如所謂，則是窳敗不堪情形，有百倍於舊日軍營者。尚何新軍之可練，而將才之可言。兄自

小站創練陸軍，以迄今日，編練各鎮，類皆申明約束，層層節制。而尤以嚴禁夤緣、應酬、克扣等事為入手第一要義。故將備之選，皆量才積資，幾經試驗而後擢用。官長則按其材智之高下，學術之淺深，必遴數人以考較，乃獲一人之推升。至於月試歲考，黜陟隨之，均屬一秉大公，何從夤緣請託？若專尚苞苴之說，更無影響。營中酬應，向來屏絕淨盡，喜壽等事，一概不准，何至將弁薪水不足上供應酬？至軍衣等件，從不由將領經手，均責成餉局及軍需官長妥慎經理。餉項則屆時另派道府大員，分赴各鎮點名關放，從何克扣？此皆在人耳目者，不知該侍讀何所見而云然也。

溯自二十九年設練兵處，建議多練新軍，兄暨吾仲實會董其成，京旗陸軍編練一鎮，吾仲又重肩其任。今如該侍讀之言，則吾兩人罄數年之心血，竭數年之棉力而為之者，竟如此也。天下清議，惟公是公非，最足入人之心。使之悅服。稍一失平，則不免解體，其理固自彰明較著。鄙意，如果各鎮實蹈此轍，則應徹查嚴懲，不稍有絲毫寬假，以伸國法而肅軍規。如各將弁並無以上流弊，則無故誣讒，墮人名節，豈不令將校寒心？此中關係綦重，似難漠然置之。雖此後認真整頓，激揚獎勵，貴部自有權衡，第目下若不查究明晰，誠恐各鎮聞之解體。用特縷商吾仲，擬即會銜入告，請簡大員徹底根查，務得實情，以免虛誣。是否之處，尚希迅速示覆，無任企禱。手肅。敬頌勛安。鵠候玉覆。如兄袁世凱頓首。十一月二十五日

### 三

宣統年間，國是日非。皇族內閣的成立，又為主張君憲的人們潑了一瓢涼水。在清朝方面，關心國計民生的人們，多把收拾局面的希望寄託在袁世凱的復出上，張謇也是積極的一員。宣統三年四月（1911年5月），於赴京公幹之前，張氏與湯壽潛、沈曾植、趙鳳昌等上海立憲派領袖，聯名致函攝政王載灃，表達政見，並託即將赴京的載灃親信趙慶寬代為痛切密陳。張氏《自訂年譜》的記述說<sup>④</sup>：

四月，滬、漢、粵、津各商會議組報聘美團及中美銀行航業事，推余入都，陳請報聘。政府以海陸軍政權及各部主要，均任親貴，非祖制也；復不更事，舉措乖張，全國為之解體。至滬，合湯壽潛、沈曾植、趙鳳昌諸君公函監國切箴之。更引咸、同間故事，當重用漢大臣之有學問閱歷者。趙慶寬為醇邸舊人，適自滬回京，屬其痛切密陳，勿以國為孤注。是時舉國騷然，朝野上下，不啻加離心力百倍，可懼也。

這裏所說的「當重用漢大臣之有學問閱歷者」，當然包括袁世凱，這也是不指名地建議重新起用袁世凱（這在下文敘及的袁對張所說重新出山的話可以得到明確證實），而且這是立憲派領袖們的共同要求。

1911年5月上海立憲派領袖聯名致函攝政王載灃，不指名地建議重新起用袁世凱。6月6日，張謇於漢口登火車北上時，致電袁世凱，鄭重約會滬上之晤。張氏深夜回到火車後，含笑對同行者說：「慰亭畢竟不錯，不枉老夫此行也」。張氏對此次滬上之晤及對袁之印象，都十分滿意。

五月初十日(6月6日)，張謇於漢口登火車北上時，致電袁世凱，鄭重約會洹上之晤。電文曰：「別幾一世矣，來晚詣公，請勿他出」<sup>②</sup>。次日下午，張謇火車抵彰德，即赴洹上與袁世凱會見。二人促膝談至夜，袁世凱摯意留張住下，繼續長談，張原來似亦預有在洹上小住一日打算，但臨時改變，以必須於十二日抵京堅辭。這次袁張洹上之晤，張氏在《日記》和《自訂年譜》中都有簡要記述，內容一致，而《日記》稍詳於《年譜》。日記說<sup>③</sup>：

十一日，午後五時至彰德，訪袁慰庭於洹上村，道故論時，覺其意度視廿八年前大進，遠在碌碌諸公之上。其論淮水事，謂不自治則人將以是為問罪之詞。又云：此等事，乃國家應做之事，不當問有利無利，人民能安業，即國家之利，尤令人心目一開。夜十二時回車宿。倪某自京來，持久香書。京師人士，群以余前電久香十三日至京，各團體將於車站歡迎。余不欲為此標榜聲華之事，故以十三日至京告久香，而必以十二日到。慰庭留住，未之許也。

張氏深夜回到火車後，含笑對同行的人們說：「慰亭畢竟不錯，不枉老夫此行也」<sup>④</sup>。不論張氏記，還是他人所記，張氏對此次洹上之晤及對袁之印象，都是十分滿意的。

張氏到京第三天，五月十四日，例行致袁函謝招待，並附信寄去所編著《光緒朝海關貿易冊比較表》一冊。袁世凱收到即行縱覽一遍，並在函封上手書了一篇批語<sup>⑤</sup>：

富強之基，繫於實業。公家多不留意，士庶又鮮新識。惟我公先覺，歷經困難，堅忍經營，開各省之風氣。進出貨列表考校，附以注說，精詳中肯，又為人所不及察，不肯為。欽佩！須以文行之。

依據袁的批文大旨，於十七日由書辦代為起草了袁覆張函<sup>⑥</sup>，表達了袁對張的推許與對會晤之滿意。

袁、張之晤，「道故論時」，徹夜長談，道論的內容，未見詳記，不得而知。所道之故，且姑不論，所論之時，當非僅只《日記》和《年譜》中所記述論治淮事。當時的時局和國計民生，想必在討論之列。這是張氏在北上前已經致函載灃，以及為到京後應對清廷召見準備了的。動員袁氏乘時復出，當亦必是論時最重要之點，甚至可以說是張氏洹上之行的第一要義。據劉厚生記述，袁張臨別之時，袁懇切地對張說，「有朝一天，蒙皇上天恩，命世凱出山，我一切當遵從民意而行。也就是說，遵從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須在各方面，把我的誠意，告訴他們，並且要求您同我合作」<sup>⑦</sup>。袁世凱罷官三年以來，現存覆人信函近六百封，內容涉及復出之事者在百封以上，不論對任何人，他都是說，決無復出之意。只有這一次，吐了真言。

袁世凱對張氏這一席話，似乎還從側面透露了一個信息，張氏此次洹上之行，或負有清廷某種說袁出山的使命，起碼張氏自認如此。

袁張洹上之晤，道故論時，徹夜長談，道論的內容，未見詳記，不得而知。動員袁氏乘時復出，當亦必是論時最重要之點。據劉厚生記述，袁張臨別之時，袁懇切地對張說，「有朝一天，蒙皇上天恩，命世凱出山，我一切當遵從民意而行。」袁世凱這一席話，似乎從側面透露了一個信息：張氏此次洹上之行，或負有清廷某種說袁出山的使命。

袁張洄上之晤，是政治領袖和社會領袖的會師，他們之間的承諾，是其聯盟的鞏固和發展。

數月之後，辛亥革命爆發，南北停戰議和。唐紹儀代表袁世凱率團南下，瀕行，袁密囑唐：「到上海後，必須想法先與張謇見面，你得告張謇，我必尊重他的意見而行事」<sup>⑩</sup>。稍後，張謇即有那一通著名的致袁氏電報：「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方，一切通過。……」<sup>⑪</sup>。這又是袁張聯盟的具體體現。

### 註釋

- ①②③⑦ 〈張謇日記〉，載張謇研究中心等編：《張謇全集》，卷6（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頁522；636；655；557-58。
- ④⑨⑭ 〈齋翁自訂年譜〉，載《張謇全集》，卷6，頁865；867；872-73。
- ⑤ 沈祖憲、吳蘭生編纂：《容庵弟子記》，卷3（1912年排印本），頁18。
- ⑥ 〈為抑制美貨事致直督書〉，載《張謇全集》，卷1，頁89-90。
- ⑧ 〈擬覆張季直殿撰〉，載張一謦：《心太平室集》，卷7，《蓮幕集》，頁6。
- ⑩ 參見〈致穰弟函〉，載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837。
- ⑪ 廖一中等編：《袁世凱奏議》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頁1219。
- ⑫ 〈派載澤等編纂官制奕劻等總司核定諭〉，載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385-86。
- ⑬ 〈齊東野語〉，載陳旭麓等編：《辛亥革命前後》（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頁26-27、29。
- ⑭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914。
- ⑮ 參見《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頁462-67；〈釐定官制大臣來電〉，載王樹枏編：《張文襄全集》，卷199（1928年刊本），頁28-31。
- ⑯ 〈閣部院官制節略〉，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摺》，第33輯（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62。
- ⑰⑱ 張一謦：《心太平室集》，卷8，頁38；37。
- ⑲ 〈為運動立憲致袁直督函〉，載《張謇全集》，卷1，頁102-103。
- ⑳ 〈擬覆三品卿銜張謇〉，載張一謦：《心太平室集》，卷7，《蓮幕集》，頁12。
- ㉑ 〈附陳籌撥考察政治經費片〉，載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袁世凱奏摺專輯》，第八冊（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0），頁2324。
- ㉒ 〈致端方電〉，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載《端方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 ㉓ 〈致鐵良函〉，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載《端方檔》。
- ㉔⑳㉕ 〈張謇政治卷〉，載《張謇全集》，卷1，頁162；162-63；232。
- ㉖ 〈張謇日記〉，載《張謇全集》，卷6，頁650。日記此處說袁張分別「廿八年」，前文電報說：「別幾一世」，光緒三十年日記謂「與袁世凱不通問者二十年」。袁覆張函，亦說是「卅年闊別」。都是指光緒十年二人在慶軍之別而言的。據劉厚生（《張謇傳記》，頁68）說，光緒二十年，袁張在京曾有過一次晤談，似乎不確。
- ㉗⑳ 劉厚生：《張謇傳記》（香港：龍門書店，1958），頁180；182。
- ㉘ 〈致袁世凱函〉，載《張謇全集》，卷1，頁162-63。
- ㉙ 《張謇傳記》，頁181-82；〈復張修撰謦〉，載《袁世凱未刊書信手稿》下（北京：中華全國圖書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8），頁1349-50。